



东方考古

第15集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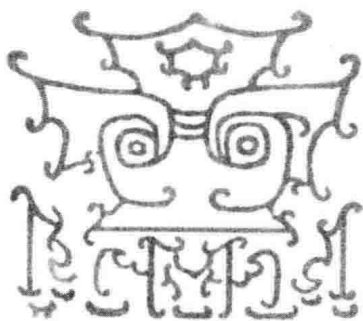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东方考古

第 15 集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辑的关于考古学和古代东方文明研究的系列丛书，分集陆续出版。本丛书以中国东方地区和东亚地区考古学为重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方法。

第 15 集收录 18 篇研究论文和 2 篇调查、发掘报告，内容涉及聚落考古、动植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考古. 第 15 集 /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03-060832-1

I. ①东… II. ①山… III. ①考古学—研究—亚洲—文集 IV. ①K8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7413 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董 苗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436 000

定价: 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东方考古》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栾丰实

副主任 方 辉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芬 王 青 方 辉 白云翔

任相宏 陈淑卿 郑 岩 郑同修

赵 辉 栾丰实 崔大庸 靳桂云

秘 书 陈淑卿

目 录

比较框架下的复杂社会历时性分析——未来的举措·····	
····· Gary M. Feinman 著 张亦弛 译 陈雪香 校 (1)	
良渚文化玉器工业初探 ·····	郭明建 (13)
由新见阳小叔豳父鼎看叔姬鼎等铜器及相关问题 ·····	黄锦前 (55)
青州南燕历史遗存及影响研究 ·····	李宝全 刘光辉 (62)
论中国货币史上的毁佛钱 ·····	马天成 邢 琪 李 铭 郭俊峰 (78)
海岱地区史前遗址 ¹⁴ C 测年数据的贝叶斯分析——审视考古年代学 ·····	
····· 龙腾文 (Tengwen Long) Mayke Wagner Pavel E. Tarasov 著	
····· 郭珊瑞 饶宗岳 靳桂云 译 龙腾文 (Tengwen Long) 校 (92)	
海岱地区年代学新成果的思考与启示 ·····	饶宗岳 郭珊瑞 靳桂云 (113)
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石镞所反映的生业格局 ·····	张 俭 (132)
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早期鲜卑生计方式探讨 ·····	张国文 (149)
中国境内史前时期羊的发现与传播研究综述 ·····	李晓哲 宋艳波 (162)
山东章丘黄桑院遗址 2012 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	
····· 张 飞 王 青 陈章龙 张 昀 陈雪香 (174)	
曲阜奥体中心战国两汉与宋代墓地人骨的病理学观察 ···	张晓雯 王子孟 赵永生 (190)
“孤木”与“丛林”——从博物馆是什么说起 ·····	宋向光 (209)
描述·解释·改变——博物馆观众研究的三重境界 ·····	史吉祥 (214)
国外考古文博类学科与专业的设置及启示 ·····	黄 洋 (218)
文化之创意与衍生——中国博物馆文化产品的概念辨析 ·····	王旭东 赵 鹏 (229)
心理学“图形—背景”视域下的提喻法在博物馆的辩证运用 ·····	张 睿 (240)
“禁止摄影”：由观众拍照观察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 ·····	赵郁颖 (250)
杨家圈遗址水田遗迹探查 ··· 宇田津澈朗 宫本一夫 栾丰实 靳桂云 王富强 (261)	
济南市长清区东王宋金墓地发掘简报 ·····	邢 琪 房 振 付 欣 王 爽 (282)

Contents

Comparative Frames for the Diachronic Analysis of Complex Societies: Next Steps	
..... Gary M. Feinman Translated by Zhang Yichi Proofread by Chen Xuexiang (1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Jade Industry in Liangzhu Culture	Guo Mingjian (53)
According to the Newly Emerged Yangxiaoshulifu Tripod to Discuss on the Bronzes Such as Shuji Tripod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Huang Jinqian (60)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Influence of Nanyan in Qingzhou.....	
..... Li Baolei Liu Guanghui (77)	
The Research on Copper Cash Casting by the Destroyed Buddha Statu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urrency	Ma Tiancheng Xing Qi Li Ming Guo Junfeng (91)
A Bayesian Analysis of Radiocarbon Dates from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Haidai Region, East China, for Evalu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 Tengwen Long Mayke Wagner Pavel E. Tarasov Translated by Guo Shanrui Rao Zongyue Jin Guiyun Proofread by Tengwen Long (111)	
Reflection on the New Results of the Chron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Haidai Region	Rao Zongyue Guo Shanrui Jin Guiyun (130)
On Life and Profession Patterns That Stone Arrowheads Reflect in the Neolithic Age in Southeast China	Zhang Jian (148)
A Study on the Subsistence Strategies of Early Xianbei from the 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 Area	Zhang Guowen (157)
Research Review on the Discovery and Diffusion of Goat and Sheep in Neolithic China	Li Xiaozhe Song Yanbo (171)
Analysis on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Huangsangyuan Site, 2012, Zhangqiu County, Shandong	
..... Zhang Fei Wang Qing Chen Zhanglong Zhang Yun Chen Xuexiang (186)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Human Skeletons from Warring States, Han and Song Dynasty in Qufu Olympic Sports Center Site.....	
..... Zhang Xiaowen Wang Zimeng Zhao Yongsheng (208)	
“Solitary Wood” and “Jungle”: What is the Museum	Song Xiangguang (213)
Description · Explanation · Change: The Triple Realm of Museum Visitor Studies	
..... Shi Jixiang (217)	

The Setting of the Disciplines and Specialties of Foreign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and the Inspiration	Huang Yang (227)
Creativity and Derivation of Culture: Concept Distinction for 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ese Museums	Wang Xudong Zhao Peng (239)
Synecdoche's Dialectic Application in Museum from the Psychology Persective of "Figure-Ground" Theory	Zhang Rui (249)
"No Photography": The Publicness of Chinese Museums	Zhao Yuying (260)
Exploration of Paddy Field Remains at the Yangjiaquan Site	
...Tetsuro Udatsu Kazuo Miyamoto Luan Fengshi Jin Guiyun Wang Fuqiang (281)	
Brief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Dongwang Cemetery Dated to the Song and Jin Period in Changqing, Jinan	Xing Qi Fang Zhen Fu Xin Wang Shuang (293)

比较框架下的复杂社会历时性分析

——未来的举措*

Gary M. Feinman¹ 著

张亦弛² 译 陈雪香³ 校

(1. 美国菲尔德博物馆; 2.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3.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内容提要: 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 许多研究都以以往强调社会复杂性的广泛模式的研究为基础, 突出了组织复杂性的广泛层级中模式变化的重要方面。然而, 本章的中心原则是: 20 世纪中期框架的关键部分要保留, 进而还需进行审慎的再评价和修改。我们很有必要运用更系统的、跨学科的方法来检验广泛的组织模式(例如“国家”)中公认的变化, 并完善目前的理论框架。为了扩充现有的比较框架, 我们需要关注几个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主张, 它们并不仅仅局限于阶层复杂性的阶梯式层级。在研究社会变迁的长期序列时, 一个有利于我们记录和解读组织复杂性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整合模式变化的框架将会提供一个更全面有力的观点, 来阐释“世界历史”及其包含的多种途径。

关键词: 复杂社会 历时性分析 比较框架 借鉴与完善

2007 年《科学》杂志评价称, “每个人的 DNA 都具有唯一性”是目前顶级的科学发现(Kennedy 2007)。更具体地说, 人与人之间基因组的差异比我们预想的更加明显(Pennisi 2007)。至少在十年前, 《科学》杂志就骄傲地宣称“人类基因组”的秘密已基本被揭开, 不过当时尚缺乏对不同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比较。遗传学家们最初设想的是一组全物种范围内的基因组图谱, 这组图谱包含个体变异的相对最小元素。不过它已经早早地表现出其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超出了大多数科学家的想象。

这些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正在被快速应用之中。或许我们这些在较长时间尺度中研究人类社会或研究深度历史的学者也可以借鉴这种发现和解释的道路。一个多世纪前, 早期社会科学家就认识到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广泛模式(例如 Morgan 1877)。不过人们常常把这种最初的认识与人类生物学的原理混为一谈。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

* 译自: Gary M. Feinman, Chapter 3 Comparative Frames for the Diachronic Analysis of Complex Societies: Next Steps, in *The Comparative Archaeology of Complex Societies*, ed. by Michael E.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1-43. 译文得到作者允许, 译者文责自负。篇幅原因, 省略原文注释。

类似的关于人类组织的总的理论体系才得以从马克思主义和新进化论的角度被重建并重构。但此时的 (例如 White 1959) 观点都与过去简单的生物学解释适当分离。尽管如此,之后的概念取向 (研究/方法) 还是和早期一样,强调社会多样性的广泛模式 [例如 Service (1971) 对人类社会发阶段的划分: 血缘群、部落、酋邦和国家], 这种模式以政治经济复杂性的不同程度来组织和区分不同的社会。正如 2001 年的早期基因组研究工作一样, 这些研究的重点还是放在粗略的模式上。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以以下这些文章标题为特征, 例如《文化的演变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White 1959)、《原始社会组织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Service 1971)、《政治社会的演变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Fried 1967)、《史前国家的演变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historic State*)》(Haas 1982)。这种比较工作的重点是研究“相似性”。并且很多讨论都认为促使全球不同地区向更高层次的组织模式 (例如国家) 过渡的各种原动力是一致的, 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这些原动力的相对优势的评估上。

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 人类学考古学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都在学习有关社会变化和社会多样性的知识。正如人类基因组的调查研究一样, 许多这方面的新知识都突出了组织复杂性的广泛层级中模式变化的重要特征。这种组织复杂性的轮廓在几十年前已经被描绘出来。事实上, 最近的比较研究已经认识到这种多样性, 相关文章也开始采用带有一些复数名词的标题, 例如《古代国家 (*Archaic States*)》(Feinman 和 Marcus 1998)、《帝国 (*Empires*)》(Alcock et al. 2001)、《酋邦: 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Earle 1991)、《理解早期文明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Trigger 2003) 和《前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集体行为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Pre-Modern States*)》(Blanton 和 Fargher 2008)。然而, 本章的中心原则是, 20 世纪中期框架的关键部分要保留, 并且要进行审慎地再评价和修改。具体来说, 我支持运用更系统的、跨学科的方法来检验广泛的组织模式 (例如“国家”) 中公认的变化。换句话说, 目前的比较方法关注的是社会变化和相似性。如果要适应并解释各种可以归入“国家” (或者“酋邦”) 的社会变化, 进一步修改理论框架十分必要。在一些相关学科中, 对于社会变化的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基于分层社会的考古学对话和考古学框架应当对目前应用于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构想和概念框架开放。我们针对人类群体和小团体的比较考古学观点不一定非要局限于过去, 最好能对更近的时段甚至是现在的社会组织研究做出贡献, 并且从中受益。

一、挑战: 理解社会变化和社会多样性

经过几十年持续的田野工作, 再加上创新型实验室分析、扩充的计算机技术和最新的档案研究, 考古人类学中对复杂社会或分层社会的历时研究正建立在更加稳固、基于更广泛地域研究的实证基础上。在全球大多数地区, 与古代政治经济有关的消息得以广泛发布, 其深度和质量都比 50 年前增加了几个数量级。并且, 在某些重要地区, 区域和家户层次的研究成果都有了明显扩大, 甚至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观点。这些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实践基础, 我们可以凭借这种基础, 以过去不可行的新方式对聚落、经济和权力关系进行评价研究。

除了考古人类学之外,很多相邻学科(或其中某些领域)的学者也在研究较长时间范围内人类社会经济的转变(以及关于变化的理论)。这些学科包括历史、古典文学、地域研究、政治学、经济史以及社会学。出乎意料的是,在如何将复杂的社会政治构成甚至一种获得广泛接受的元语言概念化以促进信息交流和比较的问题上,各学科间很少有对话讨论,也几乎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考古人类学中,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但相当一部分学者似乎总在回避系统的比较。吸引人类学以外的学者参与研究的努力也很少。事实上,尽管考古学家一直有效地向出版社、新闻界以及公众传达他们对最古老或最富有的人的看法,但在传播这一领域对分层社会兴起(和演变)的长期的兴趣以及对其做出的长期贡献上,考古学家们却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缺少有效的沟通桥梁以及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是要付出代价的。譬如说,最近的《科学》(Kennedy、Norman 2005)概述了推动当代科学研究的125个重大问题,其中包括“皮肤细胞如何变成神经细胞?”“物理学规律可以统一吗?”“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问题清单中,社会科学类的问题相对较少,涉及人类社会结构多样性的问题就更少了。一些问题则根本没有出现在清单中,例如“不平等在人类社会是如何制度化的?”和“导致人类社会兴起、衰落、重组的因素或条件有哪些?”,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把我们的历史理解为一个种类”的关键,还与评价当今政治经济动力的转变密切相关。

在这一问题清单中,和上述关于社会组织的焦点问题紧密相关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合作行为是如何发展的?”(Pennisi 2005)。当然,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人类社会变化的普遍理解。但在未来取得突破的路径几乎完全被囊括在进化生物学和博弈理论的范畴内,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人类社会团体和合作行为平衡的时空变化的考古学发现或实证发现(Pennisi 2005)。我提出上述广泛科学议程的问题并不是想批评《科学》杂志的选择,而是想表达对考古人类学与其他领域和更广泛的受教育公众之间交流和连接(或不进行交流)的方式的关注。获得最大阅读量的关于复杂社会兴起和崩塌的论文竟然不是由考古学家撰写的(Diamond 1999、2005),这一事实即便不会令人深感担忧,也会让人觉得奇怪。

理论的建构以及对历史上聚落、经济和权力的比较研究在很大意义上是“世界历史”综合考察的一个版本(Yoffee 2005: 195; Northrup 2005; Sanderson 1999: 223),它的确反映出一个关注的焦点,即人类社会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发展、重新配置以及变化的。Boas在80多年前就提出“最好将我们(人类学)的目标定义为‘试图从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人类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Boas 1932: 606)”。Boas,所设想的学术事业的关键在于,它具有全球包容性、明确的历史特征和必要的比较。

正如Smith(2006: 6)所强调的那样,在几十年间考古学理论相对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一种重现活力并且更明确的研究复杂社会的比较方法正在有序地发展。与Hunt所说的一致,“没有比较,就没有调查和知识”。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比较不应该局限于一个单一维度。与目前研究生命史和现代生物进化综论的典型方法类似,制定社会进化的比较分析方案应当考虑各种不同的方面和规模。因为这些比较分析影响着一些十

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分析方案的制定也要适当地依据这些理论问题来进行。尽管多角度比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我还是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最近出现了一种相反的理论(Yoffee 2005)。这一理论认为从整体来看,具体的社会变化序列才是比较研究的重点。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果是找到并强调许多历时发展系列的唯一性。然而,在没有对关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理解以及其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序列的更广泛的原则进行筛选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从这些变化序列中看出多少关于过去的相关性更广泛的信息。

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次,同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框架进行的类比,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因为考察人类社会进化的总体概念框架同样必须是复杂多面的(Shermer 2007; Watts 2007)。生物进化演变的具体分支序列对于生命历程研究的综合理论来说很重要,对于社会进化来说也是一样。然而,推动生物知识发展的并非那些历史序列(例如马和牛的进化序列)本身。真正能够同时从一般和具体意义上解释生命历程的,是对更具一般性的总体原则的应用。这些原则涉及繁殖策略、捕食关系、社会性、种群和资源动态(当然还有遗传学)以及其他有关这些序列研究的广泛的比较关系。

这一讨论的其他部分提出了一些主要举措,以使考古学家用于考察复杂社会的比较框架得到扩充和加强。这一正在扩大的议程应当同时包括以下两个内容:一是加强同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加强对元语言的探索,或者进一步探索结构上更广博(见 Pearson、Sherman 2005)、对复杂社会(特别是在阶层复杂性上有可比性的不同社会)变化的系统分析有促进作用的理论框架。如果有足够的学术理由可以把对非西方案例(或非西方历史)、考古学中的复杂社会或部分早期国家(曾被认为是原始国家)的研究区分开来,那么这些理由应当被证明或指向特定的问题焦点。它们不应该反映主观的或过时的学科障碍或其残留。这些学科障碍残留主要反映出至少几十年前,甚至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学术惯例或当时优先考虑的问题,它们基本上是靠学术界的惯性思维和不变的惯例才维持到今天(Wallerstein 2003)。

更具体地说,我建议,为了更系统地考虑各种变化,对考古人类学家使用了 50 多年的(强调阶级复杂性和特殊文化演变的)基本二维框架进行扩充是很有必要的。这里介绍了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几个理论主张,旨在定义和解释具有相似层级复杂度的社会变化的重要轴线。这些独立但平行的观点为理论扩张提供了方向,同时说明了加强跨学科交流的潜在增益。与此同时,它们也挑战了一些传统观念,在这些传统观念提出的限制下,可以对不同历史案例进行适当比较。

二、扩充比较框架

如前所述,对于某个特定地区随时间变化的社会序列(或者更重要的,对人为记录的转变)的考察不足以让我们理解社会的进化,正如仅仅依靠对化石记录的狭隘处理不足以解释生命历程一样。然而,在更广泛的比较理论背景下,历时观点在严格的同步分析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Adams 2004: 349)。正因如此,很不幸的是,通过对古代复杂社会的考察得出的框架和结论在针对后世国家的研究中却很少被涉及(例

如 Smith 2006), 反之亦然。显然, 广泛的对话, 即便不是比较国家和治国方略以及政治权力循环(在施行过程中的兴起、衰落和转变)的总体思想, 也能够提供很多信息, 并且可以增加过去和现在的复杂社会中可识别的模式变化的种类(见 Jones、Phillips 2005 中的类似讨论)。

正如 Trigger (2003: 3) 所说: “社会科学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 ‘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跨文化因素, 而不是特定文化的特有因素所塑造的’”。然而, 考虑到扩大比较范围的呼吁和相关论点, 我们有必要评定和重新考虑人类考古学家一般是如何构建古代国家或复杂社会的相似性和差异问题的。尽管有时学者们已经将注意力集中于复杂社会的子集, 例如小国家(城邦)(例如 Hansen 2000; Nichols、Charlton 1997) 和帝国(Alcock et al. 2001), 但是致力于构建那些将不同组织特征合成为动态变化的跨文化理论(比较和对比)的一般框架的理论建设和系统比较还是比较少的(然而可参考 Trigger 1993)。我认为, 重新定位或者扩充主要的新进化理论观点将促使考古学方法与相关学科在比较研究的努力上保持一致, 同时将释放潜力, 推动更多研究过去和现在复杂社会的总体框架的形成。

如前所述, 以下关于复杂社会变化的讨论将这种考虑与任何必要或统一的变化途径分离开来(见 Drennan 1991: 114)。换句话说, 在考察任何具体区域的序列甚至是全球序列时, 研究者都不会对整个发展进程或发展过程中任何大致的方向性转变进行假设(例如 Blanton et al. 1993: 13-23; Claessen 2000: 45-69)。复杂社会的发展进程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一是在更大的政治组织出现之前一定会先出现小的城邦(参见 Yoffee 2005), 二是最先出现的一般是较大的领土国家, 随后才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单位(参见 Marcus 1992、1998)。这两种可能的进程是彼此相反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 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可靠性。事实上, 瓦解和重新配置是历史记录的一致特征, 不同地区的历史也显示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发现了趋同的变化模式, 甚至是似乎存在本质方向性的跨文化趋势, 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种历史模式进行解释, 而不应该认为它是注定的或“自然的”。然而, 为了描述和理解社会多样性及社会变化, 我们还是有必要使用比较框架, 这也是本文关注的中心。在过去 50 年(甚至更长)的大部分时间里, Sahlins 和 Service (1960) 一直在协调之前由他们的导师 White (1949、1959) 和 Steward (1949) 提出的看似矛盾的进化论方法, 英国国家考古人类学的大多数比较方法和新进化论方法都因此被搁置。这一协调(见 Sahlins 1960) 曾经被很多理论家讨论、剖析和修改(Claessen 2000: 191-195; Flannery 1983; Sanderson 1990: 131-138; Segraves 1974; Trigger 1989: 292), 它概括了新进化论研究议程的两个核心方面: 一般社会演变和具体社会演变。基本上, 人们认为一般社会演变研究关注的是与组织复杂性增加直接相关的广泛的、共享的社会模式(例如 Service 在 1971 年提出的血缘群、部落、酋邦、国家模型的核心特征)。而具体的社会演变研究的关注点则被认为是与特定地区传统和每个案例对不同社会经济环境的具体适应情况相联系的社会变化的残留及其独特方面。具体演变的重点是每个社会文化群体、社会或地区族群独立的演变路径。相比之下, 一般演变的主要关注点是与组织复杂性的逐步增加明确相关的模式变化的定义和识别(Drennan、Peterson 2006)。许多考古学分析中都隐含着这一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 跨文化相似性通常被看作是阶层复杂性的不同等级的指

标和属性,而这些模式中的变化则被认为是以更多案例的具体因素或特异性因素为基础的。

这里推荐的框架建立在以前的研究之上,这些研究已经认识到与阶层复杂性增加相关的、广泛的跨文化演变模式。同时,我的观点不是要反对某地区或其周围地区的历史对社会多样性或社会变化有明显的、重要的影响,并以此来消除某些特定的特征(Harris 1968: 645)。很明显,看似独特的地区因素和文化因素是社会演变的一个方面。与不同程度的阶层复杂性相联系的因素是社会演变的第二个方面,尽管这不是一种使社会类型(例如酋邦和国家)具体化的尝试。我强烈希望继续严格遵循这种社会分类法或继续将其具体化的观点在其他地方也表现出来(Blanton et al. 1993: 13-23; Feinman、Neitzel 1984)。然而,如果对这种组织模式和类型进行剖析,可以想见,我们能明显发现,在跨文化层面上,不同社会的阶层复杂性和组织规模(即政治组织规模和社会的最大社区规模)要素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例如 Feinman 1995: 259-261; Kosse 1990; 本册中 Drennan 和 Peterson 的文章)。其他社会变量也与这两个因素有广泛的联系,这在很多之前的研究中都有过记载(例如 Fried 1967; Johnson、Earle 2000; Service 1971)。

然而,这里的目的是扩充现有的解释框架,加入一个新的比较层面,以便认识和系统地探索与不同跨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整合实践相关联的模式变化。在阶层复杂性有一定可比度的不同社会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虽然互不相同但仍处于一定模式下的各种社会经济一体化整合模式。

Sahlins 和 Service (1960) 的理论协调的基本前提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广泛影响着考古人类学家对相似性和差异的解释。这种二维方法对社会多样性理解的影响可能部分源于它和一些早期方法[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法(例如 Armillas 1957)和美国人类学家 Coon (1962)提出的术语“等级(grade)”“界线(cline)”(见 Sander、Price 1968: 217-218)]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个基础框架对其他研究国家的学科的影响则要小得多。要开始关于早期或现代国家的结构相似性和变革史的对话,就要将某些基本理论原则和基本公理广泛分享,使它们得到更多探索,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学科或一部分学者。根据整个学术界关于国家的丰富知识储备,主要结构相似性和跨文化演变模式不能仅仅局限于阶层复杂性的阶梯式层级[或者叫所谓的“总体进化结构”(Spencer 1997: 234)]是越来越清晰的事实。下一部分将探讨其他模式变化轴线。

三、层级模式下的组织多样性

虽然被明确描绘出来的跨文化演变的一般轴线还很少,Trigger (1993)提到了一个明确描绘的例子,但是从丰富的古代国家研究资料中总结出的模式化变异性,特别是与政治组织规模有关的特性和技术上、交流上的主要突破已经得到认可。一些研究发现,作为区域网络的一部分的小国家(常常会共享同一种文化传统)的特征(例如与邻国的高度连通性,较小的官僚基础以及对政治间交流的依赖)往往与较大国家的一般特征不同(例如 Feiman 1998; Friedman 1977; Trigger 1993)。同样,帝国的属性(规模、民族和文化差异性、通过征服和强迫建立)将其与较小的政治组织区分开

来 (Alcock et al. 2001; Doyle 1986; Sinopoli 2001: 444-447)。法律或正式主权和更多有限边界 (可定义为领土) 也是两个重要特征, 它们往往是把许多现代国家和更早期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准, 而不管这些国家的相对大小 (Claessen 1985; Spruyt 2002)。工业时代的国家通常以国家的名义要求对领土和人口享有法律主权, 这在过去并不是很常见 (Hansen、Stepputat 2006)。然而, 较早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被认为与西方政治“现代性” (Rokkan 1969; Tilly 1975) 相关的其他独特性质 (Blanton、Fargher 2008: 290-299)。最后, 正如 Marcus (2008: 259-261) 所说的那样, 可以想象, 某地区首个国家兴起的相关进程和此后其他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不同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地最初建立的国家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国家间的相似度。

如果规模和某些通信或运输技术可以与国家的其他特征联系在一起, 那么复杂社会的其他跨文化变异轴线也是值得研究的。在这里, 我重点关注了复杂社会中不同的政治经济整合模式。

通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些更多地靠理论驱动, 而另一些则是从对特定案例的更有针对性的对比中获取经验), 一些在不同学科和全球不同地区进行独立研究的学者指出, 具有高度集中、高度个性化权力的国家, 也往往更不平等, 对外部资源也有更多的依赖。或者说, 权力或权力分配安排更为分散的政治形式常常会更平等, 也更多地依赖基本经济生产。一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关注着对跨文化社会演变的另一个轴线或另一个维度的定义问题, 虽然这个定义还需要通过对长期社会变化和社会多样性的比较分析来检验, 但他们也已经提出了集中具有广泛相似性的演变模式。在本次讨论的其他部分, 我主要对这些模式做了述评。不过, 在讨论这些具体研究之前, 我先简要说一下我所说的“社会整合”的意思, 以及为什么整合模式中的跨文化演变深深植根于人类的事业。

四、整合的意义

整合已经和规模、复杂性、边界一起, 被看作是所有社会基础的核心因素或核心特征, 并且可以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进行比较 (Blanton et al. 1993: 14-19)。具体来说, 整合是社会单位和用于获得连通度的手段或机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多手段都可以实现家庭或更大社会部门的整合, 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包括经济政治整合的模式。在复杂的等级社会中, 政治整合与权力来源或政权资金有关 (例如 Brumfiel 1992: 554-555; Wolf 1982: 97)。政治人物可以调动权力或资金来获得追随者并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

Lehman (1969) 把得到系统支配的权力和成员间的权力进行对比, 前者大部分是通过机构或团体来进行支配的, 而后者存在于通过个人社会联系发展起来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正如 Blanton (1998: 141-149) 所说, 这两种支配权力的手段都包括物质和权力的认知象征基础, 尽管它们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并且会给社会其他方面带来不同影响。当然, 这些策略或权力基础都不是相互排斥的, 并且它们经常被共同使用, 只不过使用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

由于在几乎每个人类社会体系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 至少体现在性别、年

龄、能力和性格上 (例如 Cashdan 1980; Flanagan 1989), 某种等级关系或不平等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整合的关键方面。这种等级关系在动物界的很多部分都有其根源, 其中就包括灵长类动物 (Chase et al. 2002)。除了这些根深蒂固的惯例之外, 在群体中组织和发展所需的合作和社会学习技能也被认为是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 (Herrmann et al. 2007; Tomasello 1999)。这些社会惯例有助于使公开的等级行为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较长时期内, 以及在许多更小规模的社会中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 (例如 Boehm 1993)。因此, 这些看似矛盾的等级制度和合作关系的不同组合可能是人类群体相互关联的特征 (Stone 2008: 77-80)。并且, 鉴于这些特征在人类意义上的深刻根源, 随之产生的综合战略可能会以一套不同但重复的方式向模式化转变。

五、社会整合模式分析的相似之处

十几年前, 我和我的同事 (Blanton 1998; Blanton et al. 1996; Feinman 1995; Feinman et al. 2000) 把复杂社会资料库中政治经济组织的团体 (网络) 模式和排他型 (网络) 模式并列起来进行分析。我们的原始比较框架建立在个人导向的酋邦和群体导向的酋邦之间 (Renfrew 1974; Renfrew 2001), 以及基本经济和财富金融之间 (D'Altroy, Earle 1985) 的现有的跨文化对比之上。虽然我们的原始表述中有更多与一个比较连续体各部分相关的对比特征 (例如 Feinman et al. 2000:453), 但是在这里我强调了这些备选组织模型内核的关键特征。在本节中, 我提取了那些与社会整合的团体策略和排他策略相关的因素。团体组织一般与权力共享、不太明显的分层现象以及集中于基础地区生产的经济情况相关联。而更多的排他型权力配置则适合于高度集中或高度个性化的规则、个人权力网络、更明显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被长途网络和远距离流动严重削减的经济。

在一些案例中, 规模、集权、等级制度和的不平等性不会完全一致地 (阶段式) 变化, 这一团体—排他轴线有助于从概念上理解这些看似神秘的案例 (Feinman 2000, 2001; Feinman et al. 2000)。换句话说, 这些案例超出了前述二维框架的预测范围, 因为在这种二维框架中, 变化要么是一般演变结构的结果, 要么是一些特定的、特殊的因素所导致的。在一些历史案例中, 虽然权力的分配并不平等, 但或许权力不是集中在某个统治者或某个家族手中, 又或许, 虽然存在超级家庭和分层决策机构, 但是分层表现并不是很突出 (或者虽然存在不平等, 但表现得相对不明显)。从上述角度来看, 考虑到另外的变化轴线, 如果我们能形成这样的观念: 在团体性的政治组织中也会存在等级阶层, 那么这种观念能帮助我们上面这种历史案例概念化。

我们还需要注意, 团体—排他策略并不意味着文化约束。也就是说, 人们期望看到一个特定地区或社会的连续体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转变。整合战略可能在机会出现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生改变。例如, 已经有学者说明了前西班牙裔玛雅人 (Blanton et al. 1996) 和古普韦布洛人 (Feinman et al. 2000) 历史上曾出现的这种变化。与 Yoffee 的断言 (2006: 400) 相反, 这些社会整合的替代形式从来没有被用于社会类型的再形成或复活, 而是为了认识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组织多样性和社会变化模式的社会演变的重复模式。

我已经研究了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不同整合模式。显而易见,

一系列学术领域的学者已经在全球的复杂社会资料中发现了相似的模式化变化轴线或相似的差异。这包括一些对团体策略和排他策略 (Blanton et al. 1996) 的原始对比有启发作用的、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 (例如 Lehman 1969; Renfrew 1974)。不过, 这部分讨论的主要焦点是最近发表的相似又独立的概念性观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考古学家已经有建设性地独立利用团体—排他轴线来讨论和解释复杂社会的多样性及其变化 (例如 Earle 1997; King 2006; Mills 2000; Trubitt 2000; Willey 1999)。

Grinin (2004) 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相应观点对“君主制”和“民主制”国家作了对比。他认为后者以古代雅典和罗马共和国为代表, 拥有其他地区早期国家的大部分基本属性, 但政治权力并不被某一个统治者所垄断 (而是由更多的人共享、授权和制约)。Grinin 的观点很重要, 因为他认识到古代雅典和罗马共和国与其他早期国家一样, 都是存在层级的, 但是它们的政治整合模式并不是高度集权的, 权力并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全能统治者身上。

和许多团体导向的国家类似, 对于 Grinin 所分析的“民主”国家来说, 农业生产对经济至关重要, “民主国家”的税收也大部分用于财政。尽管“民主”国家也一定存在社会分层, 但与其他古代国家相比表现得并不突出 (Grinin 2004: 110-111)。与团体性政治组织一样, 一般的社会机制以及放逐法等惩罚措施都是由雅典议会投票决定的 (见 Ober 2008: 75-76)。在没有皇家法令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 这种制裁可以鼓励人们遵守文化守则。Grinin 主要倾向于将他所说的“民主”国家与西方联系起来, 但是“民主”国家的一些基本属性和那些被描述为“团体性”的非西方国家是一致的。所以较轻微的霸权行为不是欧洲或西方社会独有的。

在对更晚时期的研究中, 高度政治参与和相对经济平等之间的积极关联也在对当代政治组织的跨国研究中 (Russett 1964) 以及一个大型跨文化人种学样本 (Ember et al. 1997) 中得到了描述。在这种共时样本中发现这些模式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 因为诸如收入相对不平等的种种因素反映出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 财富创造和转移的长期代际历史。

相反, 排他性权力配置的复现性并不是古代王国、中世纪君主制国家或非西方国家所特有的。例如, 当代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行政权力日益集中和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不可能是偶然的、不相关的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工作组报告》2004; Domhoff 2006; Feinman 2010)。相应地, 针对当代社会的数学建模总体上表明了, 在以明显收入分配不均作为特征的背景下 (Acemoglu 2005; Acemoglu et al. 2004), 依赖个人网络 (通过经济交易) 加强自身权力的统一行政机构的优势是很强大的。换句话说, 当存在明显的财富差距时, 领导人可能会发现, 单方面行动变得更加容易。这种关系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 权力和财富差距的转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不同的具体历史背景下并行。

这些从当代国家研究中得出的观点表明, 国家的演变可能具有模式化的结构特征, 这种特征具有广泛的时空适用性。例如, 集中的政治权力 (和相关的个性化行为)、明显的社会经济分层以及对基于交换的经济活动 (而不是基本生产活动) 的强调同时出现的现象, 或许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更加广泛 (Blanton et al. 1996)。同时, 如果这些一致的研究被用于概括国家演变的重复模式, 而这些国家又与组织复杂性的广泛阶梯式

层级明确不符,那么就需要一个新的、更全面的框架来分析和解释国家的变化。从概念上看,既然已经认识到国家的变化不是严格地由独特的历史路径或每个文化具体的、特殊的因素所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实施一个研究计划来定义和解释国家资料库中(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发生)的模式变化。

六、通向更广泛理解的道路

对团体—排他维度的批评质疑了这些社会属性往往同时出现的原因,同时也想知道为什么整合策略可能在这个连续体中某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转变。对这些具体社会演变模式进行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可能会涉及对集体行为问题(Olson 1965)和建立在此方法上的相关作品(尤其是 Blanton、Fargher 2008; Levi 1988; Lichbach 1996)的考虑。这些观点力求通过探究拥有共同目标的个体愿意牺牲多少个人利益去承担组织工作的成本(Levi 1988: 8),来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连接起来(例如 Collins 1988)。正如 Lichbach (1996: 32)所说,当互惠合作受到个人战略行为的威胁时,就会出现集体行为问题或合作者的困境。虽然这一系列讨论看起来抽象,但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 Hobbs (2003)提出的关键困境。“个体总是在追逐自身利益,那么究竟是什么使社会联系在一起?”(Blanton、Fargher 2008: 6; Lichbach 1995)。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整合策略和实践保持了社会系统的完整性?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契约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似乎比较受欢迎?要评估这些问题,必须考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

为了解释管理制度的变异性,Levi (1988)的研究特别考察了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政治权力/政治发言权相对分散的联系。Levi (1988: 2)的关注点是统治策略、政治整合、收入和资源,尤其是收入和资源对权力的支持方式。这些因素基本包含了我们重点关注的团体—排他轴线的那些被提取出来的特征,以及其他学者的对比或比较(例如 Ember et al. 1997; Grinin 2004; Russett 1964)。Levi 的观点基本上是,依赖于开采本地资源的统治者越多,被统治者就拥有更多的约束权和发言权。或者,如果统治者的财政基础越多地依赖于外部,并且垄断性越强(例如庇护关系),那么权力就越集中(Fargher、Blanton 2007)。这一观点为传统模式提供了一种可供检验的替代选择,这些传统模式经常将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与绝对权力的表现联系起来(Bates、Lien 1985: 53-54)。

Blanton 和 Fargher (2008)通过一个大型的全球史案例样本为这些期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也说明基本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支持,在古今案例的分析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于较晚时期历史案例的研究为标志着团体—排他轴线两极的一套核心特征所表现出的模式化变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重要的是,相似的政治经济安排可以通过不同历史路径(可能在某些前提条件下)出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满足一系列必要或重要条件时,具有相似层级结构或属性的酋邦和国家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中发展[Tilly (2000)针对民主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在研究社会变迁的长期序列时,一个能让我们记录和解读组织复杂性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整合模式变化的框架将会提供一个更全面有力的观点,来阐释“世界历史”及其包含的多种途径。